

西晋士风与诗歌

——以“二十四友”研究为中心

◎ 张爱波 著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

—— 陆机《文赋》

齊魯書社

西晋士风与诗歌

——以“二十四友”研究为中心

◎ 张爱波 著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晋士风与诗歌——以“二十四友”研究为中心/
张爱波著. —济南:齐鲁书社, 2006. 11

ISBN 7-5333-1731-9

I. 西... II. 张... III. 古典诗歌—文学研究
—中国—西晋时代(265~316)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0256 号

西晋士风与诗歌

——以“二十四友”研究为中心

张爱波 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http://www.qlss.com.cn>

E-mail: qlss@sdpress.com.cn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2 插页 250 千字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3-1731-9

K·539 定价:20.00 元



张爱波 女,1975年5月4日生,博士,副教授,民盟成员。1994年考入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1998年获文学学士学位,200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04年获文学博士学位,2005年申请进入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06年任山东交通学院管理系副教授。出版专著一部《归有光抒情散文研究》(群言出版社2005年版),编著四部,在全国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参与多项厅级课题,并获得三项厅级奖项。

**“山东交通学院青年博士科研启动基金”
资 助 出 版**

序

爱波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版,请我作序。作为导师,我自然是责无旁贷,再说看到学生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有所进益,总是可喜可贺的事,故略述感想,以示勉励之意。

相对于此前的汉魏和后来的东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学界对西晋文学的关注不是太多。其中缘由,固然是因为西晋一朝时间短暂,在文学创作上缺少像三曹或陶渊明那样的大家,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此段时间的文学创作总体上表现出一种重形式而轻内容的倾向,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被批评的状态,因此除了陆机、左思、潘岳等数人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外,西晋文学似乎乏善可陈。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在中古文学这块天幕上,西晋文学的确缺少耀眼的星座而显得暗淡,但这似乎不应该成为研究者乏人问津的理由。我历来认为,文学史上某一时段学术研究价值的大小,并不一定与该时期创作成就的高下成正比。文学创作的高峰固然不乏可资总结的经验,文学创作的低谷也应该还有必须汲取的教训,尤其是那些处于两峰之间的低谷,往往有进一步深入探究的必要。现在学界都倾向于承认,尽管六朝文学就其成就而言远不及后来的唐代文学,但六朝文学的确为唐代文学的繁荣做了必要的准备。这是对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段考察后形成的看法。同样,在六朝文学这个相对较短的时段

内,西晋文学也自有其特殊意义,孤立地研究某一个作家或许意义不大,但作为文学史上某一时段特有的现象,低谷何以成为低谷,这本身就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文学史研究与文学史著述应该有不同的思路 and 不同的叙述模式,何况即使是文学史著述,也不能仅限于描述那些名作佳篇。既然是史,它理应提供更多的东西,倘非如此,所谓“以史为鉴”,在文学史著述中又怎能真正落到实处?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对于爱波的博士论文选题“西晋士风与诗歌”,我以为不失为一个颇具开掘价值的研究对象。从士风与诗歌创作关系的角度切入,可以使我们对西晋文学之特点及其成因有更多的了解,更可以借此考察文学创作之复杂性与多样性,从而矫正先前一些浮浅片面的看法。

依我之见,爱波治学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对史料的深入发掘和对文本的细致解读。这使得她在论及某些具体问题时,既能充分借鉴前贤时人研究所得,又能不为旧说所囿,而提出自己对该问题的理解。

譬如说关于“《晋书》限断”问题。爱波在引述了时贤的有关看法后,首先肯定了“《晋书》限断”属于史学问题,而与武帝统系、正始名士评价等因素无关;继而指出“《晋书》限断”问题所以难决,“主要是因为西晋建国的特殊过程和武帝本身的一种守成心态所带来的威信危机”。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分析,爱波提出了自己对此问题的见解:“西晋一朝的建立具有自己的历史特殊性。其开创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期间,司马氏父子三人虽身为魏臣,实已为晋君,改朝换代的准备和铺垫已经完成。武帝虽名为开国之君,但实际上他更是一个守成之主。……‘正始说’和‘嘉平说’都是着眼于前代功业而言的,而‘泰始

说’则无人提及，更毋庸说讨论了，这说明晋代从司马懿开国的观点在西晋初期是得到普遍认同的。武帝没有采纳这种意见，显然另有所虑。作为一个君主，他当然不愿埋没在祖先的光辉中，但他却没有提出或暗示臣下提出‘泰始说’，足以说明他自己在开国还是守成的问题上也踌躇难决，充满矛盾。因此，我们认为，《晋书》限断’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争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两点：一是西晋王朝建立的特殊过程，二是武帝作为开国之君却具有的守成心态所造成的威信危机。”这个结论，当然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也正是循此入手，爱波分析了武帝守成心态对西晋士风的重大影响，西晋士人在思想上缺乏奋发精神和在生活上追求奢华腐化，实与武帝此种心态密切相关。

再如“世族”、“势族”、“士族”三者异同的问题。对于这三个先前史书、现代学人往往混用的概念，爱波也对相关史料详加考察，作了细致的辨析。她认为，所谓“世族”，一般指累世为官、德业相继的大家族。而“势族”则是指那些掌握有某种权势的家族，西晋的势族除了包括两汉以来的世族大姓，如琅邪王氏、太原王氏、河内司马氏、河东裴氏等外，同时也包括像石苞、邓艾、邓鉴这样一些出身寒微的人。就是说，不管是出身世族还是寒微，只要在当时具有了权势，那么就算是势族。至于“士族”，实际上“包括了势族、世族和名望之士，这些人才是士族制度的基础。我们可以把某一阶段的特权阶层称为势族或世族，但是对于一种制度而言，它们都只是士族制度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一种特指，只有士族才能体现出这种制度的本质。权势有消亡，门第有衰败，但是确定的士的身份却是稳定的”。这样来区分三者的异同，问题就比较清晰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番辨析，对于西晋士风之形成演变可以从制度层面予以解说，如士人之求名心

理与致仕途径等,正是西晋士族制度的必然产物。

类似的还有关于“二十四友”集团性质的讨论。“二十四友”集团究竟该如何定性,迄今为止学界并无统一的认识,有政治集团说、文学集团说、文学集团说等。而爱波在对“二十四友”活动作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后,认为“文人集团”一说当更符合史实。这虽非新见,但她在材料的占有和论证方面却有新的推进。比如指出“二十四友”其实并无一个具体的形成时间,她以《晋书·贾谧传》为据,认为“二十四友”“傅会”的方式主要是“礼事之”和“著文章称美谧”两种,而其中任何一种方式也不是这二十四人一定要在贾谧周围或非要有一次全体聚会才能实现的。再如通过对“二十四友”成员间赠答诗的考察发现,“二十四友”集团成员之间并不是人人都互相交往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松散的,其中可以进一步分为几个有亲属关系、利益关系的小集团。他们追随贾谧是为了仕途发达,但是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差异却使其不能为实现这种目的而统一思想和行动,更不可能形成一股统一的政治力量。显然,这些分析对于更好地认识“二十四友”集团的性质很有助益。

前面曾说,从士风与诗歌创作关系的角度切入,可以使我们对文学创作之复杂性与多样性多一些认识。爱波论文第四章“石崇人格论”一节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范例。在不少人的印象中,石崇为人以奢侈、残忍著称,这种主要得之于《世说新语》的印象其实只是石崇为人的一个方面,历史上那个真实的石崇与此有着很大的不同,或者说,其性格远不止此。爱波在论文中指出,首先,历史上的石崇在西晋政坛上算得上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和作为的人,而不同于当时的清谈名士。其次,石崇为人固然有奢侈、残忍的一面,但同时他又深于情,不惜为自己所爱的

女子而冒杀身之祸,与正直之士有着密切的交往且得其敬重。通过对《晋书》及其他有关史料的考索,爱波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完整、丰富的石崇。

其余精彩之处还有不少,有心的读者自不难看出,此不赘述。

当然,爱波的论文也有其不足的地方。两年后再重读这篇论文,感觉有些部分的安排还不尽完善,西晋士风与文学创作二者的关系未能阐述得更充分。比如第二章讨论“西晋士风与诗歌”,重点谈了四言诗、拟古乐府和五言诗三种主要诗体,孤立地看,每一部分都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但总体而言,西晋士风对该时期诗歌创作的影响、制约作用未能充分显现出来,相关衔接略有松散之感。又如第二章第三节中将西晋五言之主题概括为“生死”、“进退”、“离别”颇为准确,但具体论述却没有紧扣与士风的关联。望爱波将来有机会能重新修正这些地方,使其能更好地彰显论文题旨。

论文的最终完成与出版,意味着爱波已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希望爱波一方面能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在中古文学研究方面取得更多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希望爱波能不断总结经验,记取失误,以期有所超越,上一个新的台阶。

我期待着爱波的下一部新著早日问世。

张海明

2006年10月

引言

对于西晋诗歌的总体研究，历来以沈约、刘勰、钟嵘为其发端，尤以刘、钟二人的评价对后世产生的影响较为深远。刘勰《文心雕龙》云：

晋士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衡；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①

又云：

逮晋宣始基，景文克构，并迹沉儒雅，而务深方术。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而胶序篇章，弗简皇虑……前史以为运涉季世，人未尽才，诚哉斯谈，可为叹息！^②

钟嵘《诗品序》在描述了建安诗歌的“彬彬之盛”以后，接着指出：

尔后凌迟衰微，迄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③

综观刘、钟二人之论，至少有三点应予以注意：第一，他们都热情洋溢地描述了西晋诗坛的繁盛局面。各种诗歌形式，尤其是五

①② [南朝]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478页。

③ 钟嵘撰、陈延杰注：《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言诗,由建安这一座艺术高峰之后,经过正始的相对沉寂,到西晋太康时期,又出现了一个可喜的“中兴”局面。第二,西晋诗人“踵武前王”,继承着建安诗歌的传统,所以“风流未沫”,但已“稍入轻绮”,较正始诗歌更重辞采,较建安诗歌却缺乏风骨,在“析文”和“遣词”方面出现了文过其质的倾向。第三,对于西晋诗歌呈现这种总体状况的原因,刘勰认为首先是西晋最高统治者本人不具文才,对文学事业也不甚重视,其与曹魏“三祖”不能相比,即“胶序篇章,弗简皇虑”;其次是“运涉季世,人未尽才”,即西晋在政治上是一个速盛骤衰、战乱频仍的朝代,文士的生命大多难以保全。从士风上来看,西晋一代,浮华浇薄,不具备产生内容、气魄、精神和辞采并佳的社会文化土壤。刘、钟的评价把建安诗歌作为逻辑起点,主要依据诗歌发展的必然走向,确定了西晋诗歌在整个诗歌发展中的坐标,充分肯定了西晋诗歌的短暂繁荣,但也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并从政治和士风方面给予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后代对于西晋诗歌的评价多祖述于此,很少有所超越。

唐初自从陈子昂倡导“汉魏风骨”之后,对西晋诗歌的评价有所下降。宋人诗学盛唐,文宗韩、柳,而盛唐及韩、柳皆不以晋代诗歌为是,所以西晋诗歌在唐宋人心目中的地位不高。明人忙于文派之争,或唐宋,或秦汉,西晋诗歌也没有受到重视。直到清末,少数学者开始关注西晋诗歌和诗人,以章太炎的《陆机赞》为代表。他从文采和人品两方面竭力为陆机辩护,其理由似不充分,袒护之迹也较为明显。

从唐到近代西晋诗歌研究的大体情况来看,对于西晋诗歌的评价都缺乏整体关照,所以影响不大。这个时期的研究再也没有达到《文心雕龙》和《诗品》的高度,而大多从刘勰、钟嵘的论

述中截取一端,评论呈现主观化和极端化:尚质者对其华辞丽藻深贬痛责,崇文者又赞其文华笔神,凡人难及。正统者以其时诗人品格低下,而断定其诗亦不足观;放达者又欲引以自高,而不惜曲为辩护,盲目抬高。或忙于一人之论,不见时代;或忙于牵强比附,定要挖出宗述源流;或忙于争论此高彼低,今天陆胜,明日潘强,各执一端,呶呶不休,窥豹一斑,鲜有全者。其总体趋向还是贬大于褒。其原因大体上可概括为两点:第一,西晋士风颓靡乏力。我国传统上存在着知人论世、由人品定文品的评价标准,而西晋士人许多行为都明显地有悖于这种传统的评价标准。第二,西晋诗风繁缛绮丽,有重文轻质的总体倾向,这也与我国文学“诗言志”的传统大相径庭。总的来说,无论是衡人还是品文,西晋诗歌都不能算是非常符合传统标准的,因此出现这种评价结果也是可以理解的。

从近代至今,对于西晋诗歌总体研究仍缺乏系统,尚未见专著出现。其研究成果主要以三种形式存在:一是文学史的有关章节;二是一些论著的有关章节;三是一些单篇论文。这一个世纪以来的西晋文学研究,在整个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下,经历了一个由评价偏低、零散片面到力求客观中肯、整体系统的研究发展过程。

长期以来,对于西晋文学和诗歌的总体评价偏低的,应以出版于60年代前期,作为全国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材,影响着一代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和游国恩等主编的两部《中国文学史》最具代表性。例如前者认为:“当时文学有两种不好的倾向:一是模拟古人的作品,和现实生活不发生关系;

一是一意追求词藻的华美和对偶的工整,走向形式主义。”^① 后者更进一步认为:“西晋时期,垄断了政治和经济的世族阶级也垄断了文化。在他们的把持下,文学离开了‘建安风骨’的传统,很少反映社会现实,主要成了表现世族阶级狭隘的思想感情和不健康艺术趣味的工具。为了掩盖内容的空虚,他们刻意追求形式的华美,把文学推向了形式主义的道路。”^② 长期以来,上述评价几乎成了定论,影响很大。在这里应该说明的是,笔者作为在这两部《中国文学史》熏陶教导下步入文学殿堂的一代,绝无心菲薄前贤,因为我们都清楚这两本文学史是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观念和以现实主义为主线的文学观念的制约下产生的,其观点更多地带有历史时代的特征。但是也唯其有时代性,因此它的影响也更大,更具代表性,以致现在有些论者,一涉及西晋诗歌,便视为“有文无情”、“华而不实”、“骈俪雕琢”等等,一言以蔽之,曰“形式主义”。因此,我们在对西晋诗歌研究状况进行回顾的时候,既要深刻地分析它产生的社会背景,更要客观地承认它的存在及正确地评价其影响。

80年代后期以来,西晋诗歌的总体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到来,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西晋政治、历史、哲学等研究领域的新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或是以丛书形式重版的国学大师的著作,或是近年来一些中青年研究者的新著,虽然这些著作不直接针对诗歌,但对于拓宽西晋诗歌研究的广度起了巨大的启示作用。有代表性的如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

^①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14页。

^② 游国恩等著:《中国文学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33页。

录》，利用阶级分析和集团分析的方法，对西晋的政治社会特征、封建制度、清谈格义、宗教民族等各方面问题加以详细论述，材料翔实，观点客观。刘大杰《魏晋思想论》从种族、时代和环境三要素入手，对于魏晋思想的环境、学术思想、宇宙学说、政治思想、人生观、文艺思潮和清谈进行了更切合时代的阐释。罗宗强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出版于1991年，这部著作大大拓展了文人心态研究领域，使之成了一片令人瞩目的文学史研究新天地。罗宗强先生在论著中铺开了广阔的历史政治背景，观察着哲学思想的演变，分析着士人心态的种种变化，同时也分析了这种心态支配下的士人风貌和社会风气。这部著作对于西晋诗歌的研究具有更为直接的影响力。

在西晋政治历史哲学研究全面繁荣的形势下，文学研究者们也纷纷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来重新审视西晋诗歌，虽然这种研究还不系统，但还是有许多研究成果吉光片羽，处处生辉。以下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一下：

第一，文学史的有关章节。对此应该着重提出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和徐公持的《魏晋文学史》。这两本文学史的有关章节可以说是近代至今对于西晋诗歌研究的开路者和集大成者。以它们为两端加以比较，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近代以来西晋诗歌研究发展的脉络。刘师培先生极端重视原始材料，他广为搜集与所论作家时代相近的各种评论，进行排比分析，再概括出精辟的论点和结论。他论述近代文学，首先重视其继承关系。他认为西晋文人在为人处世方面效法阮籍、嵇康，在写文章辨析名理方面学习王弼、何晏，而在论及晋代作家时，他说“六朝

论西晋文学者，必以潘、陆为首……然西晋一代，文士实繁”^①。他列举了张华、左思、张协、张载等数十个诗人，并给予陆机以很高的评价。他对于西晋诗歌的论述更是准确精到，尤其是言及对南朝文学影响一事，更是发前人所未发。从这部文学史来看，刘师培先生在研究方法上更重视从系统联系的角度审视西晋文学和诗歌，而在评价标准上也力求客观化，突破了对西晋诗歌多进行形式主义批判的传统，体现出近代西晋诗歌研究在研究方法和评价标准上的新趋向。这种新趋向通过以后的文学史研究者的努力不断地发展成熟起来。民国初年，谢无量编写出《中国大文学史》，其中特辟专章即第十三章论述太康文学，其中在第一节《总论》中，作者首先说明：“晋初文学，极盛于太康之际。”然后列举钟嵘《诗品序》、刘勰《文心雕龙》中《时序》、《才略》诸篇，以描述当时文坛的总体状况。又说：“晋至武帝，吴蜀底定，区宇始一，太康之中，文彦云会……及挚虞辨集《文章流别论》，继乎《典论》，而详于《文赋》，与潘、陆、张、左相先后，而挺誉文囿者焉。”^② 谢氏在评价时，还保留着一种较为传统的文学史写作方式，即多采集史传及钟嵘《诗品》中的有关论述，借以表明自己的意见，但是他能注意做到对当时文坛盛况的详细全面论述，这就比一些只介绍几个主要人物的文学史全面的多。另外，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中第五章为“两晋”，其中他将两晋文学分为两派：一派的特点是奇丽藻逸，以潘岳、陆机、陆云、左思为代表；一派的特点是清微淡远，以王羲之、陶渊明为代表。分类脉络清晰，切中肯綮。第二节他详论了陆、潘诸人。钱氏才华横溢，文采斐

① 刘师培著：《中国中古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54 页。

② 谢无量著：《中国大文学史》，中华书局 1918 年版，第 48～49 页。

然,因此,他对于陆、潘等人的艺术成就和影响感触良多,而评价也较为深刻。他在论及陆机诗歌时说:“澹而不绮,散而不整,于机为别调……要之诗之由古体开律意,文之由建安为永明,不得不推机为风气转变之枢焉。”^① 这里对陆机诗歌的特点和地位给予了公正的评价。评价的点面结合和脉络清晰使得钱氏对于西晋诗歌的研究取得了许多超越前人的成就,同时也大大推进了西晋诗歌客观化系统化研究趋势的发展。而1999年出版的徐公持的《魏晋文学史》可以说是集中体现了这种研究趋向,并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在这里,徐公持先生用一编的篇幅对西晋文学进行了详细论述,其中在第一章“西晋文学概说”中对于“西晋社会文化与文学”、“西晋文学精神特色”的分析非常精辟。他从统治者对于文化的宽松政策谈到儒学、玄学和佛教道教的并存,认为“士大夫各投所好,形成西晋士人文化思想学术上的多元化局面。这是在宽松夷旷的大背景下形成的西晋文化基本特点。西晋文化的可取在于斯,缺失亦在于斯”^②;“西晋文化的缺失,主要是缺乏崇高精神”^③。对于西晋文学精神,他认为一个特点是“传统政教精神的弱化,淡化”,另一个特点,“在于对于文学创作技巧问题和形式问题的重视”^④。这些观点融合了近代以来对于西晋社会历史哲学的许多研究成果,并加以作者长期从事西晋文学研究的切身体会,极具深刻性。同时此书还对于长期以来西晋文学研究中带有争议性的很多问题作出了新颖独特的解释,如对于“二十四友”的重新定义、潘岳的人品与文

① 钱基博著:《中国文学史》(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55页。

② ③④ 徐公持著:《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253、261页。